



了解和研究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历史，延安公开发行的《新中华报》是必须重视的史料来源。在1937至1941年间，《新中华报》刊发的关于中央党校的消息、通讯报道，以及校领导和学员的文章，有33篇之多，涉及党校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中华报》创刊于1937年。1937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适应全国抗战的形势，党中央决定把1931年12月在瑞金创刊的《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在1月29日发行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41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出刊，报头为毛泽东题写。《新中华报》存在将近4年零4个月，在此期间，它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宣传渠道，也是外界了解中共及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陕甘宁边区）的窗口。

### 为《新中华报》撰稿

《新中华报》登载的来自党校的稿件共9篇，分三类。第一类是党校学员投稿，只有一篇，即1937年4月9日刊发的罗青长的文章《桥儿沟的列宁小学校成立了》。罗青长当时是党校学员兼校党总支青年委员，文章介绍了党校青年委员会筹办列宁小学校的经过及开学的情景。文中说：桥儿沟的青年和儿童大多数没有读过书，党校迁来后，“当地的青年儿童都跑来同我们玩，要求读书，于是青年委员会便决定办一个小学校，施行国难教育。”“校址在党校附近，教职员都是党校的同学担任，尽义务，时间是每日下午二至四时。课目有日本侵略中国的统计、常识、算术、识字、新文字、唱歌等等，纸笔书籍皆由党校捐助。”“到校的共有男女二十九人（党校青年的事务人员十几人在外）。”短短500字反映了当年党校学员做群众工作的情况。他们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为他们排忧解难。

第二类是党校来信，共三封。其中有一封是1940年7月1日中央党校



## 报底觅踪

### ——《新中华报》字里行间的中央党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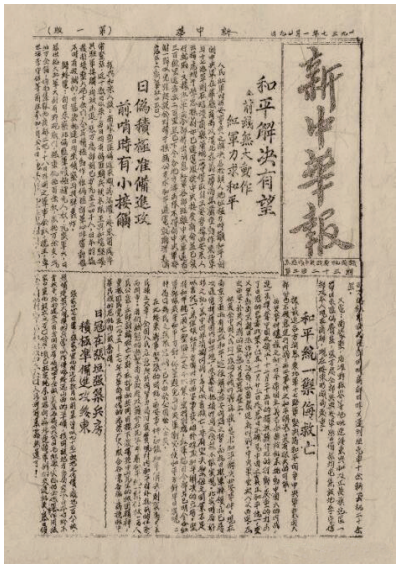
□ 谢武军

“七一”纪念大会向党中央委员会祝贺建党19周年的贺信，在7月9日的《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信中说：“党在不断地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壮大起来了，党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大踏步的前进了；毛泽东同志成为我党及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旗帜！”“处在抗战严重困难的关头，全中国人民都追随着党中央所指示的光明灿烂的方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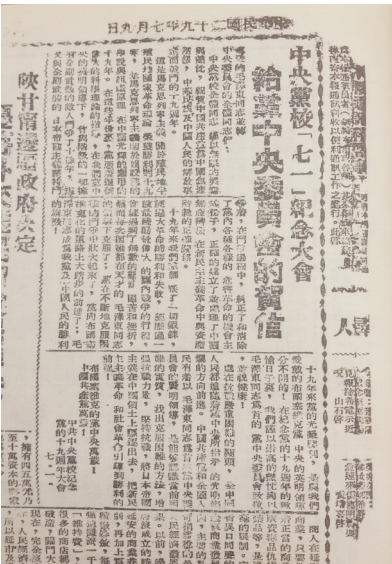
还有一封信是1940年7月30日《新中华报》刊发的中央党校全校大会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的粮食，本是仅够吃的，但为了救济十数万灾民，全体教职学员一致同意实行节省，来响应边区党政军及民众团体联合号召之‘一两米运动’，我们愿将两月节省所得捐作赈粮，救助绥德等地的受灾同胞。并希望‘一两米运动’能在边区各地广泛开展。”1940年6月下旬至7月初，陕甘宁边区各县冰雹洪水成灾，农作物和财物损失严重。边区党政军及民众团体联合开展“一两米运动”，号召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每天每人节约一两米救济灾民。中央党校师生积极响应，7月22日召开全校大会作出捐粮的决定。

第三类是校长邓发的文章和演讲，共6篇。其中讲话和报告两份，文章4篇。4篇文章为：《迎接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发扬“二七”精神，反对反共投降亲日派——纪念“二七”十八周年》《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为“五一”纪念》。

邓发校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我党我军保卫、机要、航空及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邓发只读



过两年私塾和三年初小，他的革命史也是他的学习史。从15岁参加香港海员工会到工人夜校学习开始，他就刻苦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后来还自学了英语、俄语。坚持不懈地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文化素养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色的领导才能相得益彰。邓发善于演讲，长于写作。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亲自给学员讲授《党的建设》和《抗战中的职工运动》两门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材料丰富，实例生动，深受学员欢迎。他发表在《新中华报》的文章有些内容具有研究论文的性质，如《在中共中央纪念“二七”惨案十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一文，探讨了“二七”惨案的历史、“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及职工运动史上的意义及经验教训。如《论抗战中的民生问题》一文探讨了抗



日战争与改良民生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改良民生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针。

### 消息记载史实

《新中华报》关于中央党校的消息有14条，客观地记载了相关史实。如1937年7月下旬，延安各界热烈募捐，援助二十九军将士英勇抗战，中央党校捐五十六元九角八分，为各机关学校团体之首。

1937年10月下旬，由西北青年救国会和妇女各界救国会发起，动员边区各界织毛袜、手套八万双，支援八路军军冬季抗战。中央党校应完成的任务是手套袜子各150双。11月29日《新中华报》公布第一次统计结果，中

央党校已上交袜子188双，手套199双，还有卫生衣一套，超额完成任务。

1939年春天大生产运动开始。开荒期间，党校完成任务情况居中，排在中宣第七位。开荒终结，党校完成任务情况上升为第三位。后来，中央党校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还帮助鲁艺和统战部完成了开荒任务。

1940年12月初，中央党校礼堂建成。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周年，中央党校俱乐部在礼堂公演苏联四幕话剧《破坏》……

透过这些消息，不仅得以窥见当年中央党校师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也可以对当年党校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 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新中华报》关于中央党校的通讯报道有10篇，大部分以当年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为内容。其中较长篇的报道5篇，生动详细地描述了中央党校开荒、春种、秋收等情景，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如刊发在1939年4月13日的长篇通讯《党校在突击中》，记叙中央党校从3月21日开始开荒种地，240多名男子强劳力组成4个拓荒大队，每个大队都分成3个小队，轮换挖地，人歇工具不歇。垦荒队天蒙蒙亮就出发上山，3天内就把附近300多亩荒地开垦出来了，又转移到离校10多里地的荒山上。女生们分成3个队：送茶饭队、洗衣队、烧水队。送茶饭队每天上午要翻山越岭为240多人送茶水和菜饭各一次，下午送茶水二到三次。

洗衣队十来天共洗衣1400多件，补衣700多件。烧水队每天要挑七八十担水，烧热了供开荒的英雄们回来洗脸洗脚。大家劳动时你追我赶，不怕苦不怕累，休息时痛快地娱乐：“在绵延五里远的山坡上，悠扬的音乐和悦耳的歌声，随着温和的春风传播到各处。”“有时在山坡上出现了谢副校长和生产委员会主任的影子，那时，在各队里的欢呼声便一时震动了山谷。”劳动间歇大家还“研究讨论各类问题。学习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9年10月6日的长篇通讯《秋收突击在党校》，记叙了中央党校第一次秋收的情景。其中还记载了学员们在劳动中讨论的问题：“小队长拿出教务主任为秋收突击而出的三道题：1.在你们收割中可想到一条自然规律，这规律是恩格斯说过的。2.在你们秋收的过程中可想到一条社会规律，这规律是马克思说过的。3.……学员们谈到了自然改造人类，人类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改造了自己。”文中还写道：“原定12天完成的收割600亩黄米的计划3天就完成了。当晚学校加餐，并召开慰劳会。”

1940年3月22日的通讯《一年之计在于春 生产运动开始了》，介绍了中央党校的春耕生产动员大会。文中写道：动员大会开始前，“大家围在山沟里的广场上，看那才下乡宣传回来的‘三八’秧歌舞队跳舞，欢呼与歌声交响在山谷。”动员会上，校务部部长方仲如报告了去年本校生产情况、今年的生产任务和生产组织办法。邓发给大家讲述生产的意义，指出：生产运动在边区，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把口号变成实际，胜利地粉碎了日寇的经济封锁。为了坚持抗战，改善生活，不仅边区进行生产运动，全国也应进行。生产运动对年轻的党员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在困难面前，是否有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最后，动员会在“努力生产……努力苦干……”的歌声中结束。通过这个报道，可以了解到在1940年初，党校便已经有了秧歌队，而且还下乡开展宣传活动的史实。

## 党校红色记忆



## 陪父母过丰收节

□ 赵自力

老家在农村，每年秋季都要举办一次丰收节。

我家的丰收节定在国庆节那天，这样我和妹妹都不用请假，可以带着孩子好好回家过节了。农历八月一到，母亲就开始张罗，不是电话或是视频，嘱咐我们兄妹莫忘记回家过节。

丰收节临近，气氛也浓起来了。晒干的稻谷和花生，装入袋里后码得高高的，看着就格外踏实。红火的朝天椒，被母亲挂在大门的两旁，就像一副喜庆的对联。屋檐下，玉米棒子挂了几排，金灿灿的样子显得格外富足。至于农家小院，更像个晒场似的。油亮的板栗，摊在油布上懒懒地晒着太阳；花生已经晒足了，抓起一把摇摇，能听见响声；还有红红的柿子，一捏能冒出水来。父亲早已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边，摆好了木椅。风清气爽的秋日，庆祝丰收，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国庆节里的丰收节也带有了仪式感。我们在小院子里插上了鲜红的小国旗。傍晚的时候，全家人坐在葡萄架下，每人先分享一小碗南瓜汤，意思是忆苦思甜。接下来，父亲开始作“报告”了，他把一年的丰收成果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虽然辛苦些，但父亲母亲都很开心很知足。父亲讲完了，我家的丰收节拉开了序幕。各种农产品就陆续登场了，挤挤挨挨地摆满了石桌。刚摘下的花生，洗干净放铁锅里煮，加些食盐和八角，剥开一颗，热气腾腾的香气直扑鼻。晒干的花生，倒入铁锅里炒熟，嚼一颗满嘴飘香。板栗

生的香甜脆口，熟的粉嫩有味，都是我们的最爱。红苕也有许多花样，蒸的煮的都来点。丰收节这天，母亲还会蒸点糯米饭，放在锅里焖，焦黄软糯，不要菜也可以吃上一大碗。家人团圆，当然少不了做汤圆，都是自家现成的材料。糯米粉过筛，搓成小汤圆，煮好后撒点白糖，格外好吃。至于蔬菜，都是田地里新采摘的。新鲜的萝卜缨子浸了盐醋，爽口脆生。想吃饱满的蛾眉豆，到院墙上摘几把就是。土罐地地豇豆，是我们那里的特色，加上几片肥肉，味道更鲜美。

丰收节那天父亲格外高兴，总爱倒上一小杯酒，小口小口慢慢地品，就像品味着美好的生活一样。我们敞开肚皮吃起来，轮番和父母敬酒。节后，母亲总爱大包小包地给我们打理，嘱咐我们尽快吃完，可不能浪费了。回到工作的城市后，想家了就吃把老家的花生和炒板栗，能吃出家的味道。

后来，村里也兴起了丰收节，父亲还是主持人呢。我们照例要回去参加，坐在台下享受着视觉盛宴和舌尖上的美味，更开心的是与家乡老乡亲分享过好日子的喜悦。从此，丰收节成了日子里最重要的期盼，以至于一到秋天，就会惦记着回老家看看。陪父母过丰收节，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



## 晚清“救时宰相”阎敬铭

□ 石 磊

论起晚清对朝廷政局比较有影响力的大臣，阎敬铭应该算是一位。但是从清廷授予的谥号来看，对比同期政坛同僚曾国藩的“文正”、胡林翼的“文忠”、王文韶的“文勤”，阎敬铭的谥号“文介”，并不突出。这对于有晚清“救时宰相”之称的阎敬铭，似乎有失公允。纵观阎敬铭的一生，虽是翰林出身，但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儒臣，无论其是在地方施政，还是在中央理财，都颇有建树，政绩可圈可点。并且虽处高位，但清正廉洁，堪称“循吏”。

**建功湖北。**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考取二甲进士，入选翰林庶吉士，散馆后任户部主事。咸丰九年（1859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听说户部主事阎敬铭性格刚正，精通理财，于是上疏朝廷奏调阎敬铭到湖北任用，总管湖北前线粮台营务。在湖北办理军需之时，阎敬铭巧于调度，对粮饷的出账与进账计算得清清楚楚，受到胡林翼的称赞。咸丰十年（1860年），阎敬铭擢升从五品的员外郎，赴岭东乡剿匪有功，又擢升正五品的郎中。胡林翼非常认可阎敬铭的才干，对其评语为“公正廉明，实心任事，为湖北通省罕见之才”，荐举其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病逝后，继任湖北巡抚严树森也十分赏识阎敬铭，称赞阎敬铭为“才可救时，湖北贤能第一”。

**赈灾山西。**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由于干旱发生大饥荒，百姓流离，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山西巡抚曾国荃上任后请求赈救，但由于连年战乱，“仓库所存无几，而待赈之民无算”，大量灾民束手待毙。朝廷多次派员前去赈灾，但是进展不大。此时在家养病的阎敬铭被朝廷委以钦差身份派往山西赈济灾民。到任后，阎敬铭明察暗访了解时弊，雷厉风行认真赈灾。他执法不苟，查拿了吉州知州段鼎耀等贪官，并严厉弹劾了礼部尚书恩承、礼部侍郎董华等大臣对山西州府的滋扰，蠲免、缓征了山西

重灾地区百姓的田赋和丁役，根据灾民的贫困程度发放钱粮赈济。此外，通过抚恤孤寡、安辑流亡、施放医药、以工代赈、建立义仓等措施，与山西巡抚曾国荃和衷共济，一道施赈，受到三晋百姓的交口称赞。

**改革户部。**光绪八年（1882年），鉴于阎敬铭突出的理财能力，清廷提升其为户部尚书。满清官制，六部堂官都为满汉双重，满人掌印，权力高于汉官，可满员的实际办事能力又不及汉族官僚，于是只能委任一些奸猾刁钻的吏员参办具体事务。阎敬铭早年曾在户部任职，深知其中弊端，出任户部尚书后，他决心革除积弊。上任第一天他就亲自查看户部北档房的账册，并找来档房满族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主事、员外郎，还是郎中，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以及出纳和盈亏状况。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折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目张，而财弄虚作假愈甚，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清政府库款困乏，虽然害怕汉族官员权势提升，但是面对整顿度支的迫切要求，也只好同意了阎敬铭的奏请。与此同时，阎敬铭针对户部下辖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在管理中存在的储物堆积、霉烂变质、账册不清、胥吏贪污等问题，进行大力整顿。他亲自入库清点银两储物，核查出纳账册，将清廷立国两百多年的账目核实一清，并将“渔猎”户部库房的司官姚觀光、董俊汉、杨洪典等人奏参，阎敬铭雷厉风行的举措震惊了朝野。

**不畏权贵。**晚清内外战争不断，地方督抚权重，通过户部报销军费本是惯例，但是报销者往往买通户部司官、书办，并向户部堂官行贿，将非军事开销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以中饱私囊。光绪八年（1882年），清政府平定了云南地区的民变后，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军费报销一事，派出云南军务后路粮台崔尊彝和永昌知



府潘英章携带巨款到京师行贿，打通关节，最后以八万两白银了结此项报销。后御史陈启泰上奏此事。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潘祖荫、麟书等人查办此案。此时阎敬铭刚刚升任户部尚书，正在努力整顿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现象。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派阎敬铭会同刑部官员审理此案。最终在阎敬铭等正直官员的坚持下，涉案官员全部获罪受罚，其中受赃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太常寺卿周瑞卿革职赔赃；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继等官员遭革职流放；云南粮道崔尊彝虽已病故，仍令革职，由其家属退还赃款；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署理户部尚书王文韶被逐出军机处；工部尚书翁同龢因失察，罚俸九个月……云南军费报销案是晚清朝廷腐败的缩影，此案所涉官员众多，假若当时没有阎敬铭参与审理，势必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设立义仓。**光绪九年（1883年），阎敬铭入值军机处，他上疏朝廷建议兴办新疆屯田，以强化清廷对新疆的统治。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授阎敬铭为东阁大学士，仍管户部。由于受到“帝党”大臣以及西方列强的舆论压力，慈禧太后打算归政光绪

帝，自己前往清漪园养老，但是授意朝廷需重修清漪园。主持户部事务的阎敬铭上折力阻，劝说治国以节用为本，这令慈禧太后甚为不悦。不久，阎敬铭被迫辞去军机大臣。光绪十三年（1887年），阎敬铭多次上疏请求告老，召准。回陕后阎敬铭虽处江湖之远，依旧壮怀不已，回报桑梓，不仅捐资修建义学，他还倡导在朝县县城西侧建起一座丰图义仓，可储粮一千万斤。这座粮仓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座民间粮仓，并一直沿用了50多年，发挥了民间储粮用粮的重要作用。

奈何封建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救时宰相”终究救不了世。《清史稿》说阎敬铭“为势所限，终不能行其志”，能臣再“能”，作用亦是有限。但阎敬铭在任上，确实做了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值得点赞。

